

天津市中共党史研究会纪念
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暨第二届
学术年会论文选

天津市中共党史研究会

天津市中共党史研究会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暨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选**

天津市中共党史研究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老一代革命家在早期活动中怎样探求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程 抚 (1)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	王永义 (9)
略谈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卢印玺 (16)
马恩列斯著作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	孙在友 (25)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工读互助团·····	刘健清 (32)
试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条件·····	李 蓉 (38)
《响导》周报是如何传播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	窦爱芝 (44)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形成的原因初探·····	刘景泉、黄小同 (5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李境顺 (56)
在探索中前进	
——试评一九二八年顺直省委两次扩大会议的几项决议案·····	陈 克 (66)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刘世凯 (74)
马克思主义“和平赎买”的设想在中国的实现和发展·····	李锦坤 (81)
李云汉否认“华北防共协定”证据不足·····	邵云瑞 (88)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创建起来的·····	高德福 (92)
附：已发表和未收入本论文选的文章目录·····	(100)

老一代革命家在早期活动中 怎样探求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程 抚

人类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年了。在他创立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

中国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追本溯源，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老一代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纪念马克思的时候，回顾我党老一代革命家在早期活动中怎样探求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拓一个新时代的斗争历史，对我们实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是十分有益的。

一

老一代革命家探求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前，虽然马克思主义产生已有七十个年头，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我国少数先进人物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它，接受它。直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

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涌现出来，是因为这时国内外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五四运动时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第二，一九一五年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客观上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第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一条争取解放的道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真理。第四，以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它对待殖民地革命运动所持的错误立场，采取了积极态

度支持和帮助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先进的中国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当时能够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

但是，在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方面的条件。从老一代革命家找到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过程来看，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具体条件和特点，但也有共同的因素，这些因素，概括地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老一代革命家继承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由，反对压迫，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革命传统。他们胸怀祖国，关心人民，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局面深为忧虑；对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状况抱有深切的同情。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李大钊，在早年上学期间所写的《隐忧篇》中，即描绘我国处于“敝舟涂泛海洋……固猷在惶恐滩中”^①反映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心和关注。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看到一本小册子，描写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对祖国的未来非常担忧。^②少年时期的朱德，听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奸淫虏掠烧杀抢劫无恶不做，而清政府却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时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所有这些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精神，是老一代革命家寻找真理的强大动力。

二是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忧国忧民的思想激励下，老一代革命家以极其顽强的精神寻找革命的真理。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后，国内宣传新思潮的书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到国外勤工俭学的人数激增，各种进步社会团体纷纷成立，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迫切心情。到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因为身体有病，没能上学校、进工厂。但他每天手里拿着字典，仔细阅读书报杂志。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选择重要急需的“猛看猛译”。^③他在对各种主义综合以后，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和世界，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周恩来为寻找真理，东渡日本，回国后参加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并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监禁，但他在狱中仍和大家一起学习科学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向一同被监禁的同学和进步分子做了多次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④出狱后赴法勤工俭学，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徐特立早年从事教育，在湖南很有声望。辛亥革命以后，还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但他看到旧中国依然如故，就愤然辞去了副议长职务。以后为寻求真理，虽已年过四十，也毅然到法国勤工俭学。由于年龄大，记忆力差，学习中困难很多，但他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弄不懂的就向他人包括自己过去的学生请教。当时湖南省反动当局，曾以年俸一千元的重金，邀请他在法国考察教育，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继续坚持到工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⑤。还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理论，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探求马克思主义。

三是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老一代革命家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读书，不问现实斗争情况。而是在阅读各种新思潮著作的同时，

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斗争，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密切注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寻找革命的真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从回顾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许多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一一碰壁的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指导工农革命取得胜利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学习俄国，接受马克思主义。^⑥老一代革命家还从自己或他人走过的弯路中得到教育，受到启发，从而认识到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从而向往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四是勇于解剖自己进行自我革命。廿年代前后，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还是青年，没有经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阵地还不够巩固，社会主义思潮的流派很多。因而他们很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一些曲折的道路。例如我党老一代革命家恽代英，早年曾受过基督教的影响，成立过互助社，以后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相信过“教育救国论”，他还搞过改良主义的“新村”。经过多次的探索，不断地纠正错误的认识，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决心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革命老前辈吴玉章，早年曾宣传过维新变法，相信过“天赋人权”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接受过三民主义，搞过单纯的军事冒险活动。^⑦一次再次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但他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地寻找新的途径。五四运动后，经过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自看到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和反动腐朽势力的虚弱本质，感到革命有了希望，决心改变过去革命的方法，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斗争，走俄国人的路。这些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的思想革命，是老一代革命家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探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先驱李大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在我国，他第一个写文章赞扬十月革命，赞扬布尔什维主义；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他的主持帮助推动下，发展进步青年团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指导青年参加革命的实践活动。他所做的大量工作，促使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成长。

由于老一代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走过曲折的道路，从学习、研究、实践、对比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从一九二〇年夏天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⑧周恩来一九二三年在一封信中说：“我们应当信仰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办法，则当因时制宜。”“我所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它为它宣传奔走。”^⑨教育者首先受到了教育。老一代革命家的出现，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二

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老一代革命家，深切了解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使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复杂性

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老一代革命家以极其顽强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传播马克思主义。

1、向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积极的斗争。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⑩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还不占优势。它的传播必然要触犯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站住脚，而且能够扩大自己的阵地，就不能不同封建复古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多方面的，也是反复多次的。在建党前后即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论战。

第一次是一九一九年七月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次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革命。挑起这次争论的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他认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不要去谈什么主义，特别反对谈马克思主义，他说什么“谈主义是极其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⑪把解决具体问题同主义割裂开来，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胡适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解决具体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能就事论事，搞改良主义。胡适不让别人谈主义，可是他却大谈其美国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其根本目的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告终。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发生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由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引起的。他们以英国学者罗素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根据，认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而主张改良，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国内条件，批判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谬论，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在中国要进行彻底革命不能搞改良；无产阶级要进行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辩论马克思主义又取得了胜利。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创立起来了。

第三次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这次论战时间较长，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开始，一直延续到建党以后。由于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比重很大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曾有广泛的影响。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即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写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立即取消一切政府，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组织纪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他们指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消一切强权是不可能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就会复辟。他们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本质；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

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的必要性。经过这次论战，最后，无政府主义者的著名代表黄凌霜等表示承认错误。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这就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三次论战中，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理论准备不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还没有真正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故而不能不在论战中存在着某些观点不够准确等缺陷，但是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扩大和提高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对党领导的革命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2、以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深入宣传发动群众。

我国的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他们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宣传教育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封建思想、小生产观念还有不小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之间，还有一道鸿沟。因此，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确是一件困难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

老一代革命家深刻了解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钊所写的《青年与农民》和以后的其他文章中，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毛泽东、邓中夏、陈潭秋、彭湃，王烬美、刘少奇等到工农群众中去做调查、宣传和发动工作。他们都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克服了许多困难，打开了向工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局面。

邓中夏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开始时他在洋车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经过初步接触，串连了几位洋车工人，一天聚集在一起，并在马路旁将人力车围起来开会。会刚开始，一群警察骑着大马冲到跟前，人被冲散了，车也被踩烂了。这时工人急了，“回去后怎样向车行交代”。生活没着落又不太觉悟的洋车工人就埋怨起来说，“是他们出的主意，要他们赔偿损失”。邓中夏这时急得满头大汗，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赔给洋车损坏最严重的人，很狼狈地回到学校。^⑩第二次他到学校印刷厂活动。有一个年轻工人很热情，相互交谈后，约定第二天再找几位工人一块谈谈。可是第二天当他去后，那个工人情绪低落，说工头不许他接触外人，并威胁说不听话就要开除。这一次又碰了壁。另一天他又去印刷厂，想同拼版工人交谈。但干拼版工种的工人不少的是工头的亲戚，中夏不了解这种情况。他刚进门，还未谈话，里面就冲出来十几个怒气冲冲的大汉要打他，他被迫逃走了。一次再次的挫折，并未使邓中夏灰心。他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一块分析失败的原因。认为洋车工人等行业多是个体手工劳动者，比较分散，受行会思想的影响很深，应当把工作重点首先放到代表无产阶级特性的近代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和同志们到长辛店铁路工厂，访问工人，与工人同吃、同住，了解工人生活状况，与工人打成一片，和工人史文彬等交上了朋友。同时改进了工作方法。采取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等形式，向工人进行教育。经过一段细致深入的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举行了第一次数千工人庆祝五一节的示威游行。接着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使长辛店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⑪

彭湃从事农民运动也经历了很多曲折。初到农村，有的以为他是来讨账的士绅，有

的以为他是来收税的官吏，因而只是应酬几句，或者不加理会便躲开了。尽管彭湃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一再宣传，但是农民被欺骗的人多，总是怕彭湃的话是说谎。^⑭农村的豪绅地主则乘机造谣中伤说他是被撤去教育局长职务，郁闷在胸，得了神经病。但彭湃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和初交的农民朋友一起仔细地分析原因，认识到，一是自己穿戴特殊，农民把自己当作外人；二是讲话太文雅，农民听不懂；三是活动时间不恰当，白天农民很忙，不愿多说话怕耽误干活。找到这些原因后，彭湃就脱下学生装，戴上尖顶竹笠，光着脚板，身带农民常用的旱烟袋，到农民中宣传时注意用通俗语言。他还利用晚上时间，或选择农民劳动后歇脚的地方进行活动。他还帮助农民一起干活，吃的也是自带的硬饽饽。在讲演前或放留声机，或教耍魔术，或牧童唱歌，以吸引农民，然后宣传演说。^⑮当他总结了经验改进了同农民接触宣传的方法以后，农民对他的态度逐渐改变了。有的农民愿意同他交谈。他在农民中交了朋友，起初人数很少，后来逐渐增多，于是他便开始组织农会小组。随着宣传工作的开展，农民觉悟的提高，逐步扩大了农会组织。从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开始活动，到一九二三年五月，约一年时间内，在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的五百多个乡中发展农会会员已达二十几万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也曾不同程度上遇到过这样一些曲折。但由于老一代革命家所具有的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把马克思主义带到工农群众中去。并在宣传发动工农过程中也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使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

3、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教育工农和青年。

老一代革命家在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根据工农群众的实际情况，注意做到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使缺少文化的广大群众和青年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新的道理。在我党成立前后，所举办的面向群众的许多报刊杂志，象《劳动者》、《劳动界》、《伙友》等等，还有各地创办的许多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都注意采取工农易懂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工人熟悉的生活表达出来，同工农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他非常形象地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相互关系比作一座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的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一层的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他们都还有一条吸血管连接着，残酷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结成联合战线，起来进行斗争，压在他们身上的几座大山一定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⑯毛泽东的生动讲课，使当年听过课今天已年近八十高龄的老同志还记忆犹新。

为了启发群众的主人翁思想，破除“宿命论”，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解放，老一代革命家想方设法驳斥反动阶级的欺骗和鼓舞群众的斗志。刘华、邓中夏在上海一个工人

俱乐部向工人讲课时，一个工人说，东洋老板说什么“穷工人一辈子别想出头，因为‘工’字出头就是‘土’字，工人出头就是入土”，意思是一出头就要死。这时邓中夏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工”字，他指着“工”字说，这个“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这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接着刘华在邓中夏写的“工”字下面加了个“人”字，然后说，“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个‘天’字，我们工人就要做天下的主人，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大如天”。^⑩这种生动机智的讲话，给工人群众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为了消除群众中不利团结的因素，教育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用“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的比喻，启发群众团结。刘华在纺织工人中宣传团结重要性时说，一根纱能拉断，一百根纱一千根纱拧成一股绳，力量再大的人也别想拉断它。工人一个人起来反抗力量小，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斗争就会胜利了。邓中夏向长辛店工人讲团结就是力量时说，“五个指头分开就没力量，但是握紧了拳头，就有劲了。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象条龙，百人团结象泰山，推也推不倒，摇也摇不动。”^⑪用这些生动形象而又易懂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启发了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觉悟。

4、为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勇于献身

身教胜于言教。如果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行动上不去做，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宣传就会被人看作是不可信的，因而也不会有好效果的。坚定的老一代革命家，总是严以律己，以忘我的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这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许多好的榜样。

肖楚女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当教员时，患有严重的肺病，这种病在当时还是没有好办法医治的危险病症。大家很担心他的健康，但他并不以此为负担，在课堂上仍然提起精神讲课。由于肺病常常咯血，为不让学员看见，他将带血的痰暗自吐在手帕里。下课后，则精疲力尽地长时间喘不过气来。同学和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婉言谢绝，仍然坚持工作。他说：“蜡烛不是能够放光明吗？做人也要象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⑫他说自己的人生观就是蜡烛的人生观。这种毁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一生光明磊落的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鼓舞着多少有志于革命的青年。

为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常年离开自己的家乡，辞别父母妻室，到处奔波。他们并非不愿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故愿“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帝国主义相反抗”。^⑬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一些老一代革命家，为实践伟大的理想，不惜与旧家庭决裂。彭湃搞农民运动，他的地主家庭的兄弟们因此和他分了家。分家后，他就把分得的全部土地田契，在他家大门口当众烧毁，并且通知佃户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这一实际行动在当地农民中产生了用言语宣传所不能达到的深刻影响。江西的曾天宇，一九二一年冬回到家里，耐心地动员其父亲将霸占来的田契归还给佃户，然后自食其力。他的父亲坚决不答应。曾天宇决定同父亲、哥哥分家。他把分得的一份田地的地契，无偿地还给了佃户。表现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甚至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后，虽受尽折磨，但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屈。最后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以坚定的语言向敌人宣告：“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②⑧}著名共产党人夏明翰牺牲前写下的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为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就是对广大青年、广大群众的极其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撒遍祖国各地的红花种子，终于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共产主义事业正在胜利前进。

※ ※ ※

老一代革命家在建党前后探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大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可是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正确的革命真理之后，宣传发动群众，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不到两年时间里，在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里就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也逐步兴起。随后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老一代革命家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但是要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后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老一代革命家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了集体的智慧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国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革命家探求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可贵的革命精神；要珍视老一代革命家经过千辛万苦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的向前发展，把人类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注 释：

- ①② 《李大钊传》第9—10页、第220—221页。
- ②⑧ 斯诺：《西行漫记》第111—112页、第131页。
- ③⑨ 《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10页、第29页。
- ④ 《五四爱国运动》第64页。
- ⑤⑤⑩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集，第120—121页、第14—15页。第1集，第198页。
- ⑥⑦ 《吴玉章回忆录》第113—114页、第240—245页。
- ⑩ 《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 ⑪ 《每周评论》第31号。
- ⑫⑬⑭ 《邓中夏传》第45、45、58页。
- ⑭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19页。
- ⑯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1页。
- ⑰⑳ 《不屈的共产党人》（一）第125页；（二）第346页、第129页。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

王永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随着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的。李大钊同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敏锐的洞察力、渊博的知识和探索真理的顽强精神，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当中，最早实现了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最先比较系统也比较正确地在中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最勇敢也最有力地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中国人知道在世界上有个马克思，是在十九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一八九九年二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团体，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一二一期，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说“德国的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著名者”，“主于资本者也”。

（即著《资本论》）同年五月，该学会又出版了由英国社会学家企德著、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一书，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德国讲求养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此后，一些逃亡日本的改良派人士梁启超等，创办《新民丛报》、《浙江潮》等刊物，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作过一些介绍，并且翻译了一些日本人谈社会主义的著作。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其创办的《民报》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九〇六年，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理论家朱执信在《民报》二、三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事业，并且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后来，上海《东方杂志》、《新世界》等刊物也发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东方杂志》一九一一年第六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 楷尔·麦克（卡尔·马克思）。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一九一二年《新世界》刊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反对专制迷信，宣传民主科学为宗旨，大量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作了更多的介绍。但是，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这种介绍还只是作为一种欧洲新思潮、远远谈不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作了许多介绍，对社会主义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影响作了充分的阐述，说“社会主义披靡欧美”（《浙江潮》第八期）“影响达于全球”。（《新民丛报》第38、39合刊）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大肆歪曲以致攻击。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75号《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麦喀（马克思）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今以此手段（国有制）取之，则国家其无乃先盗矣乎？”攻击孙中山倡“平均地权”是“摭拾”“麦喀等架空理想之唾余。”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革命的参考，启迪人们的思想。朱执信说，“介绍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所期者，教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尤有所资也。”（《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但是，他们不理解也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孙中山在内。孙中山就说过，“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孙中山选集》785页）

李大钊同志出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五年的一八八九年，他进入中学正值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一九〇五年。他的青春时代，正处在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各家学说沓来纷至，书报刊物名目繁多，而国势之陵夷，又使他深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再造神州之不可缓。李大钊同志为从各派学说中求索救世济民之良方，以惊人的艰毅精神研讨各种思潮，探索救国真理。当时，他作为一个急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他同时代的先进分子一样在立场和世界观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没有能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中国问题。但是他深切体察民间疾苦、不囿己见的进取精神，强烈的爱国热忱和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研讨方法等特点，使他迅速突破急进民主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成为在中国实现从急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转变最早的一个人。当然，李大钊同志的思想转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他深受过达尔文学说的影响，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解释人类社会，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得出结论说：“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青春》）这种观点显然对“国族”、“国民”都缺乏阶级分析。但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却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激发起无穷的革命活力，使他的思想象打开闸门的洪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囿，”摧枯拉朽，永往直前。他在一九一五年以后所写的《青春》等文章中，已具有许多辩证法因素和显示出某些唯物史观的闪光，为在此后实现思想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李大钊同志和他同时代的先进分子一样，也接触到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影响，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思想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有所反映。但由于进化论思想影响很深和其他各种原因，使他还没有能够实现在思想发展上的飞跃。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他不能区别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区别，往往用生物进化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这就难免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如认为

“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性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从而得出避免革命的错误结论。他也分辨不清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界限，认为“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乃不可得也”的错误结论。但是，李大钊同志永不疲倦的探索精神和不囿己见的正确态度，使他能够密切联系现实斗争的发展，不断对自己提出新问题，并坚信新的比旧的会好。他相信和推崇过欧美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但欧美的现实又使他怀疑，坚信“其起易代之者，度其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民彝与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包藏祸心”制造侵略有理的谬论，竟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战争与人口问题》）从而对进化论产生深深的怀疑，他的思想又向更高的境界升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看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崭新政权，倍受启发和鼓舞。他毅然抛弃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

李大钊同志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就迅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剖析现实一切社会问题。一九一八年一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人们的心目中影响很深，被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视为楷模，包括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名，当时正担任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也对法国革命视若神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一种崭新的革命出现了。中国革命应效法哪种革命，是当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李大钊同志以醒目的标题，鲜明的观点，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两种革命进行比较分析，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科学地判断十月革命代表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的新潮流，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号召人们“翘首以迎”。不久，他又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的演说和论文，针对那般别有用心，颠倒历史，狂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荒谬论调，尖锐地指出，引起大战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瓜分殖民地。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感到“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函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劳工社会（无产阶级）看破他们的野心，起来进行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才促使这大战告终。这是劳工主义的胜利，这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同志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形势所鼓舞，热烈欢呼十月革命后“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形势。他准确地判定，在这种滔滔滚

滚无可防遏的世界革命群众运动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极其兴奋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还极其深情地说道，在这世界新纪元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新纪元》）

正当世界新纪元的曙光射进黑暗死寂的中国，爱国的青年志士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启发、鼓舞、指导下“翘首以迎”这革命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悍然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对运动的领导，更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威力。特别在群众抗议运动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终于迫使政府答应罢免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很大胜利之后。李大钊同志及时于五月十八日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政治》一文，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信誓，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引导运动深入发展。

李大钊同志领导着爱国运动的健康发展，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也激励、鼓舞和推动着他的思想向更高的境界迈进。运动的发展向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使他更加深切地感到革命运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促使他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更加勤奋地钻研并努力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仅一九一九年一年，李大钊同志就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分析形势，剖析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并把由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大量介绍“马克思生平”、“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的文章。在这一期还刊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教授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译文。李大钊同志自己在《新青年》六卷五号和六号连续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署名李大钊。他以这样极其醒目的标题和署名表明自己坚定的信仰和鲜明的立场，在当时是罕见的。这篇论文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系统、也比较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开拓的作用。文章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说明三者不可分割的联系，贯穿着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文章还阐明，马克思主义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依靠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篇重要论文，作为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难免有个别不当之处，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是正确的。此后，李大钊同志在《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等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在北京一些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对传播马克思主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以后，在“五四”运动期间运用马克思

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指导运动深入发展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是当时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人，如陈独秀等所不能比拟的。

三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反动势力极端的仇恨和恐慌，地主买办阶级和他们的御用文人，把马克思主义视若“洪水猛兽”、“逆端邪说”，肆意诋毁和攻击。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内部，也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生分化。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反动势力妥协，站在地主买办阶级一边。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公开跳出来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武器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胡适。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极力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对社会实行革命的改造，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挑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利用当时人们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心理，采用诡辩的手法，把宣传“主义”和解决问题完全对立起来，恶毒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作的事。”并煞有介事地说，空谈“主义”容易出现“冒牌”，这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他甚至开出一连串北洋军阀政府下令严禁“过激主义”的事例来吓唬。胡适的这个挑战是极其恶毒的，他是将一束毒箭同时射来。当时正在河北省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同志看到胡适的这一挑战，当即写了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即《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的一系列反动谬论以有力驳斥，发表在同年八月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他针对胡适的恶毒攻击，首先表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自豪地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的一切。”接着，李大钊同志就逐一批驳了胡适的恶毒攻击。他驳斥胡适把“主义”和“问题”割裂并用枝节问题的研究代替宣传“主义”的谬论，指出，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应当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也就必须使他们接受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行动的准则和衡量是非的标准。没有“主义”的指导，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而社会上多数人不认为是共同的问题，你那个具体社会问题便永远没有解决希望。所以，我们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一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因为反动派诬蔑他们宣传“过激主义”或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放弃“主义”的宣传。恰恰相反，正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就愈发应该宣传自己的主义，并“本着主义去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

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李大钊同志的这篇论文，给胡适抵制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粉碎性回击，并用胡适的话回敬了胡适，驳得他体无完肤。李大钊同志在驳斥胡适谬论的同时，还精辟地阐明中国问题应该“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说明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大批革命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方向，也使胡适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在一九二〇年底，胡适气急败坏地大肆诬蔑《新青年》成了“苏俄的汉译本”，要《新青年》发表宣言，“声明不谈政治”，甚至提出停办。这种谬论也同样受到李大钊等的批驳。胡适的挑战在马克思主义面前遭到惨败。李大钊同志是这场论战公认的主将。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陈独秀，影响着“五四”时期一代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使其中许多人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胡适遭到惨败之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采取更加狡猾的手段，以冒牌的社会主义反对和破坏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一二〇年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规模论战。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反动谬论，是利用罗素来华讲演的机会提出来的。罗素来中国，在张东荪的陪同下到处讲演，散布反苏滥言，诬蔑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应该走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的道路。梁、张等人乘机发表大量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特点是打着“社会主义研究”的幌子，一面虚伪地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一面又荒谬地断言：中国没有劳动阶级，“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三卷四号）因而中国没有条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不妨迟迟”。（张东荪：《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新青年》八卷四号）他们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将来通过劳资协调，建立“协社”，避免阶级斗争就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罗素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假社会主义富于虚伪性和欺骗性，具有更大的危害，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当时受李大钊思想影响又通过“五四”时几个月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认识旧民主主义道路行不通，也实现了从急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面对假社会主义的挑战，陈独秀、李达等发表许多文章，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的反动谬论，论述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实现社会主义。李大钊同志也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下之实业》等论文，从时代的高度和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上深刻地阐明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帝国主义残酷压迫下的中国，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他说：“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他还说，发展实业在中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同上）李大钊同志在批判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还适时地提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实行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深刻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要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